

論反佛迫害中的佛像破壞

艾利克

艾墨蕾大學

佛像是什麼呢——

可以用黏土塑成，能觸手可及、可被推倒、被粉碎的佛是甚麼？什麼是可以被摧毀的佛像呢？一般說來，在西方的佛教中，對待佛像的方式形形色色。

甲.

迷信的教徒們都隨身攜帶佛像。他們愚昧地認為手中的佛像就是佛或神，而這恰恰是對佛教“真義”的誤解。雖然有人可能會同情這些單純的崇拜者，但佛像的毀壞在這種意義上說卻是理性的進步。還有一些人長篇大論地反對把佛像作為偶像崇拜，認為對佛像頂禮膜拜未必就是敬畏神明。

乙.

佛像是心靈的寄託，能激起人們的感情，喚醒人們的佛性；同樣，從它們的學術意義的角度解讀，佛像僅僅是文化範本。無論如何，只要我們有重建的方法，佛像的毀壞就不是對“佛教”的真正威脅。只需重塑一尊佛像即可。

丙.

佛像是純粹的藝術品，即是**雕塑**而不是偶像，是在陳列架上的人類文化樣本。在這種情況下，破壞偶像是收藏家的失敗。歷史上有時殖民者以保護偶像免遭破壞威脅的名義而名正言順地奪走了土著具有的聖物，因為這些本地人，有時由於自身的原因，想毀壞他們的聖物。

將佛像視為偶像、象徵或藝術品的觀點都不足以解釋亞洲的佛像。最近的學者集中探討了象徵性的和儀式性物品以及它們的創造和維護，這使我們目前對佛像的

理解更加豐富和複雜。佛像不再僅僅是一個象徵，現在它通過諸如點眼或開眼的祭祀，禮拜的秩序，或者傳奇故事、學術論文等其他途徑成爲一個現實的存在出現在許多學術作品中。

佛教過去和現在都是“財富的網路”，一個龐大的物品系統。佛教物品的重要性引起了很大的經濟價值，包括寺廟的建設和維護，塑像和其他物品的製作，念珠的銷售等。大型的宗教機構是傳統上重要的金融、工業、農業、工藝和貿易經濟中心。對大多數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受過思考和哲學訓練的東亞人來說，佛教作爲財富的真諦是很明顯的。也許一些人認爲佛教的不朽證明了佛的存在和權力。但另外一些人認爲寺廟和佛像消耗了社會資源。最近的評論家雅克·格內特（Jacques Gernet）認爲：“佛教建設消耗的所有物品中，貴金屬和銅構成了這種固定的無收益資產的核心。”

與經濟學有關（價值、財富、交換等）的比喻遍及佛教徒救世神學的論述。甚至佛寶—法寶—僧寶這個術語也是經濟學的“三寶”。針對三寶的物質性，律宗大師道宣（597 -667）將佛像（由石頭和木料做成）描述爲“主持佛”，將經文的教義和教典描述爲“主持法”，將活著的和尚和尼姑描述爲“主持僧”。將所有的佛、釋迦牟尼佛、佛像和僧侶聯繫起來的一系列的多位一體理論，爲佛（宇宙化身）與其他的或多或少難脫塵世的佛之間建立了教義上的聯繫。佛是不變的，也是手工製作的。

道宣說寺廟負責維護這些寶：“實假敷說之勞，誠資相狀之力名僧寶也。”他接著解釋法和佛，根據它們明顯顯現法並最終超越了文字，因此文字和文本是“住持法寶”。雖然據說聖人已經消失了，但聖像卻保留下來了，稱爲“住持佛寶”。佛顯然是不存在了，但佛像就是“佛寶”。道宣更進一步解釋說雖然三寶的真諦超越了物質的形式，但這些實在的物體是佛的化身，而且如果一個人有相當高的精神修養，他就能夠認識到這些實物的本質。他哀歎說，可悲的是愚鈍的人們只看到了物質方面。

物質財富和拯救（佛像和佛、布施和善緣）的同類化關係包括經濟的神聖化——將物質財富看做神聖的，和神聖的經濟化（或物質化）——將神聖的物品看做經濟財富。寺廟的物品和世界財產不僅是佛教的偶然性的上層建築，而且在教義和救世神學體系中也有清楚的作用。由於“功德”，佛教的物質化使財富在救世神學上有重大意義。現金、絲綢、土地等布施變成了僧侶的財產和物質，並通過一系列的同類化（三寶＝住持三寶）變成了佛自身的神聖的實質。然而，宗教物品的物質化也使得佛教徒易受言語和身體的攻擊，反佛教分子經常強調佛像的物質性，正如傅奕所言，“甚至對待佛像就好像它們是磚和瓦一樣”。從一些故事判斷，佛像本身也十分嚴肅的看待自己的經濟價值。《洛陽伽藍記》講述了南陽一個叫侯慶的人曾許願為一尊銅佛重塑金身，但他違背了自己的誓言。他的妻子夢見佛像對她說：“你和你丈夫向我許諾要為我重塑金身已經很久了，現在我要帶走你們的兒子作為你們失言的賠償。”很快，他們唯一的兒子死了。“死的那天，佛像自己變成了金色，光輝四射，居住在附近的人都聞到了芳香。”

沒有什麼關於生產的邏輯結果即毀壞的描述。毀壞這種“現實的存在”究竟意味著什麼？

滅佛

“破壞偶像”在基督教歷史上通常分兩個特殊的時期：拜占庭和宗教改革時期的偶像破壞。但是在其他時期和地方，偶像也繼續地或多或少地被有意無意的暴行毀壞，幾乎就像它們的產生一樣頻繁。但是，在中國偶像破壞的時期更加集中，而且通常都是由帝國政府發動的。

四次最大的迫害是“三武一宗”：北魏的太武帝（424-452），北周的武帝（561-578），唐代的武宗（841-847）和後周的世宗（954-959）。另一種說法叫“四次毀佛”，既“四次滅佛運動”。在這些滅佛運動中，以會昌年間唐武宗為甚。

一般認為會昌滅佛是中國佛教“黃金時代”的終結，儘管歷史記載經常誇大這些運動的作用。

日本的目擊者圓仁（Ennin）寫道：

他們剝落佛像身上的金，粉碎銅佛和鐵佛並且稱量這些金屬的重量。可悲呀！這些銅佛、鐵佛、金佛對這個國家有什麼限制呢？然而，根據帝國的法令，所有的佛像都被毀壞並夷為廢品。

但“廢品”並不十分準確。這些佛像成了什麼？圓仁（Ennin）告訴我們：“最近，一份有關帝國命令的文件表明，銅佛和鐵佛都被粉碎，稱其重量並上交給鹽鐵局，有關於此的報告將上報給皇帝。”“帝國的命令宣佈，地方及其下級政府必須剝掉全國鍍金銅佛身上的金，稱其重量並獻給皇帝。”《舊唐書》提到佛像和鐘身上的銅將用於國家鑄幣，鐵用於製造農業工具，金、銀和玉上交國庫。”金屬被重複利用——毀壞一個金屬佛像意味著佛像的毀壞而不是金屬的毀壞。佛像、鐘和其他的金屬物品被製造成硬幣、農業器具和武器。（當然，相反的程式也是可能的）同樣的，寺廟的木頭被再用於修建道教寺廟和皇家的祖廟。

在經濟困難時期，帝國需要金屬。九世紀中期的唐朝被財政負擔困擾，包括對抗回鶻的戰爭，帝王日益增長的奢侈消耗，建立強大的宦官組織，以及由於通貨短缺引起的長期貨幣貶值問題。許多資料將武宗皇帝描述為一個狂熱的道教徒，堅決主張廢除佛教。但經濟危機只是迫害佛教的一個原因。正如賴肖爾（Reischauer）指出的，政府陷入資金短缺的危機，它們覬覦較大的僧侶組織的財富，就像圓仁（Ennin）在五臺山描寫的那樣。僅僅這些廟宇裏的小黃金塑像和聖物箱，大的鍍銅塑像和青銅鐘就占了可利用的金和銅這兩種主要的貨幣金屬供應總量的很大比例。將它們鑄成大批金銀貨幣，對恢復已虧空的財政大有幫助。

佛像的經濟價值是實實在在的，因為在崇拜者的想像中，它巨大的經濟資本很容易轉變為象徵資本。它的經濟價值是它的精神慷慨的有力象徵。它的黃金是它的肉體自我轉化的有力象徵。但是佛像的經濟價值（尤其是金屬的價值）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佛像很容易被製成硬幣或刀劍。唐代反佛教者（和我的大學本科學生）指出，另一個問題是對世俗財富的拒絕和一些僧侶的富裕之間的明顯矛盾。（道宣對“住持三寶”的深刻的反應可能不被寺僧和學術圈以外廣泛閱讀）

將佛教的金屬、教義和肉體神聖化的動力肯定是因為這些東西具有或者暗含經濟價值。這些資本儲藏的神聖化使它們退出流通領域。許多資本仍然變成了僧團的集體財產，儘管僧團是一個以宣稱超越於“塵世”為特徵的社區。僧團像一個社團，具有集體所有權，不論個體的死亡或錯誤都保留它的自治。因此僧團是一個虛構的實體，但仍然有作為所有者的法律地位。但是在某些財政危機時，國家侵略僧廟並掠奪它們的金屬，強迫僧侶還俗或取消僧侶受戒儀式。佛像被周期性地熔化，僧侶也被“熔化”並在經濟系統中重新分配。

肉體和佛像

在佛教發展中，僧侶和佛像的類似之處十分普遍。最近的研究已經探索了佛像被視為有生命的實體的方法。但是這種類比是雙向的，因此有人可能也會問僧侶的肉體如何像佛像。正如皇帝在玄奘死時所說，“我們失去了一個國寶”。這位著名的神聖的僧人在這裏被描述為一種“財富”，一個經濟學上的比喻。或者這僅僅只是一個比喻嗎？

在宗教儀式和佈道活動中，佛像的創立是與僧侶的受戒儀式並行的；在宗教儀式中對佛像的虔誠也表明了對僧侶的尊敬。在著名的僧侶理想化的圓寂過程中，僧侶在死前就進入了三昧境界，就像點眼儀式的一部分，將佛（像）置於三昧之中。因此，當僧侶的肉身由生到死，由一個有感知的生命體變成一個物體，他就像一個神聖的佛像——表面上沒有生命，肉身卻可能轉化為舍利，繼續受到膜拜。佛教徒（尤其

是禪宗）強調思想和身體絕對靜止，盤坐蓮花台進行修煉，可以看作是想變成塑像的嘗試——“即身成佛像”。一些有道高僧的肉身甚至被塗上油漆——製成塑像——由此完成僧人和佛像的對應。舍利——尤其是有道高僧的舍利——被放入佛像中，以求延續其生命。福勒（Faure）寫道，“佛像也是一種佛塔或陵墓，正如佛塔是一個建築體一樣，是死者的體現。像木乃伊、舍利或進入三昧的皈依者一樣，它是活生生的，存在的，清醒的。” 偶像破壞因而處於二者之間，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它試圖消滅佛像的內在生命性（但卻因此確認了佛像生命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表明或宣稱佛像不具生命性。

許多關於佛像的故事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在崇拜者的身體與佛像的身體之間的一種強烈的對應。玄奘說，在印度，“如果一個人得了病，他可能會在佛像的身上與他自己得病的相應位置上貼一張金箔，他的病立刻就會好。” 這種做法現在在泰國很普遍，一些佛像上貼滿了零散的方形金葉，尤其在臉上、頭上、心上和生殖器周圍。

反佛教者也用這些類似的術語來描述僧侶和佛像之間的對應，尤其是當他們覬覦僧侶們固有的財富的時候。但是僧侶們在很早以前，爲了他們自己的目的，就已經提出了這種同類化關係：強化佛像有生命性的理念，把僧侶澆鑄到佛像之中。道宣寫道：“肉身就像木頭和石頭；經過雕刻和打磨，它就變成了器（法身）。” 將肉體比喻成工匠 熟練勞動的產品，非常像佛像的產生。僧侶受戒以前的身體，經過工匠的熟練勞動，加工成受人膜拜的佛像。在道宣關於加工佛像與僧侶肉身之間的相互聯繫的描述中，僧侶受戒以前的身體的加工工藝十分清楚：“金屬、石頭和泥巴做成真正佛像的外貌。法衣和落發決定了僧侶的形像。”

道宣對實體的佛像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佛經說：修建一個佛像就像種小麥，獲得的益處不會喪失，因爲它是法身的器。” 如果佛像精神的現實存在的斷言和某些觀察者隨意所見的佛像“僅僅是塊木頭”的感覺相背，道宣就用典型的佛教概念來解釋：我們對物質的體念取決於我們的感覺是否純潔。道宣引用《大智度論》：“所有的佛都常年佛光四射，講經授道。由於前世的罪孽，塵世中人即站在佛的面前也看

不見他。顯而易見，如果一個佛像如此，那麼其他佛像都毫無例外。” 道宣的觀點是以佛—法—僧的非二元性以及真實和傳統的非二元性為前提的。

熔化肉體

在很大程度上，對佛教的反對就是專門對寺院制度的反對：它逃避土地稅和人頭稅。傅奕鼓勵消除這種有害的外來欺騙從而恢復稅收經濟的實體。

“很久以前，褒姒只是一個女人，但她謀劃迷惑周幽王（周朝，西781前771）並使他亡了國。今天這種情況更甚，和尚和尼姑多達百萬，雕刻的、絲織的、石膏的佛像都用來迷惑普天下的民衆——這難道不是喪國的例子嗎？如果皇帝能收服這百萬群眾並使他們相互結為夫妻，經過十年的養育子女，十年的教育和訓練，那麼就有了足夠的士兵和農民，難道還有比這更大的利益嗎？” <<舊唐書>>

這裏我們看到一個被稱為破壞分子、削弱國家的女人；接著，佛教僧侶被暗中女性化；對這種危險的性別混亂的建議的解決辦法是讓它們娶妻生子。這裏也有經濟生產的問題：稅收、絲綢、石膏、農民和士兵。唐代早期的其他人也有相似的批評。例如，李嶠曾寫道：“目前，所有的健康男人都湧入寺院當僧侶，士兵都虔心信教；國家怎可獲得足夠的收入用於征戰和稅收呢？”除了金屬，國家也需要人力，尤其是農民和士兵。有組織的偶像破壞從不僅僅局限於佛像；它也攻擊偶像保存者。也許其實很實際：既然皇帝的官員們毀壞佛像，他們也會攻擊或毀壞它們的生產方式，亦即廟宇。這種對佛教群體的攻擊也削弱了這個最有可能反對偶像破壞的群體。

像偶像一樣，僧侶的肉體是生產出來的物品。正像佛像的產生表明了對僧侶的受戒的語言和儀式上的對應，因此我們也可能會問是否熔化佛像與驅逐和尚和尼姑相對應。在某些情況下，也許僧侶是被殺害了，但更關鍵的問題是，迫害者摧毀生產方式，攻擊產生和維持它的特色的方法，這些特色使某一肉體偶像化（如一個僧侶的肉體）。帝國繼續努力限制僧侶的產生，比如迫使僧侶還俗。換句話說，就像熔化一

個銅佛像使之從一個聖物變成原料，還俗使僧侶變成了世俗的軀體；並且，正如銅可以被鑄成硬幣和武器一樣，這些被迫還俗的僧侶可以轉化成農民或士兵。反佛教者明顯地利用了把人的身體當做原料的比喻。

會昌滅佛的措施是一系列的非常嚴厲的強迫驅逐，開始是“壞”的僧侶，接著是所有的年輕僧侶，漸漸包括所有的僧侶。在不同時期，僧侶們都有嚴格規定的睡覺時間，受到旅行的限制或被處死。同時，皇帝正監督道教廟宇的修建；鑒於為建築材料而挖的坑太大（風水不好），皇帝建議砍下所有剩餘的和尚和尼姑的頭來填坑。也許是考慮到傅奕的評論——或許有些恐懼——他的顧問們用經濟學的觀點回應：“如果他們恢復世俗的生活，自己過活，這將會對國家有利。”

總結

考慮到所有的把偶像當做肉體和把肉體當做偶像的聯想，我認為偶像破壞總是與肉體毀壞相連。最近在巴米揚的佛像毀壞引起了對塔利班政權毀壞或消滅某些其他肉體的注意：諸如被迫遮蓋肉體的人，殺死的人，以及因為未遮蓋肉體而被殺害的人。這些抹煞個性的行為和對佛教偶像破壞是非常相像的。因此，在中國僧人被皇帝處死時，甚至摩尼教徒被斬首時，都是先披上僧袍，並被剃髮，然後再處死的。

殺害一個作為偶像的軀體可能會採取真正的殺戮形式，也可能消除重建肉體所象徵的途徑。佛教徒的肉身也是實際的塑像，所以偶像破壞運動幾乎總是反僧侶的。例如，在8世紀歐洲偶像破壞中，“政府極其強烈地反對僧侶，這些僧侶是主要的聖像維護者。修道院被摧毀，僧侶被驅逐、拷打甚至處死。”“僧侶法衣被禁止，修道院變成了兵營，軍隊是尤為瘋狂的偶像破壞者。”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狂熱的偶像破壞期間，通過殺戮和其他方式，紅衛兵的偶像破壞活動伴隨著瘋狂的個性抹殺。例如，“穿著也改變了。接下來的十年中國人穿著單一的黑色衣服。”正如一個檢查員用黑墨水塗抹五彩的詩篇，統一的服裝掩蓋了個體的特性。剝奪或隱藏一個人能被辨識的特殊標誌也屬於偶像破壞。

然而，只有當創造這一偶像（不是博物館裏的一幅畫或雕塑）的信仰被消滅以後，偶像的毀壞才會結束。同樣的原因，具體化的“宗教意識”可以從大眾的偶像破壞中幸存下來。當鮑威廉拜訪成都的一座早已沒有佛像的破敗的寺廟時，他講述了中國的老婦向她們的孫女說明在寺廟裏如何以及在哪里磕頭；這裏沒有佛像，但寺廟的空間結構仍留在她們的心中。“這些老婦正在告訴年輕的姑娘們如何做，指出牆邊佛像曾經存在的位置。她們給這些記憶中的佛像磕頭，儘管它們早被移走。”